

《資本論》典故注釋選輯

(二)

， 中 共 中 央 高 級 黨 校

A-4
000088

C2

編 者 序

德意志的讲坛社会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二，序7〕

“国家社会主义”系19世紀中叶出現于德国的一种地主資產階級反动思想体系，它的真正奠基人是洛貝尔图。

約翰·卡尔·洛貝尔图（Johann Karl Rodbertus, 1805—1875年），是德国資產階級經濟学家，資產階級化的普魯士容克地主的思想家；在1848至1849年革命期間，曾是溫和自由主义的政治活动家，普魯士国民議會的中間派左翼領袖；后来，他热心于宣传普魯士“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

洛貝尔图指出了資本主义矛盾的急剧尖銳化，特别是階級斗争的尖銳化，然而他的目的只在于寻找挽救資本主义的药方。洛貝尔图写道：“应当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保持劳动、資本和土地所有权在社会經濟上的階級区分”（“資本。給封·約翰·卡尔·洛貝尔图·雅格佐的第四封信”）他所杜撰的“国家社会主义”，就应当算是这样的手段。

洛貝尔图所說的“社会主义”只是对工人階級的一种欺騙，它和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变革毫无共同之点。在洛貝尔图看来，社会主义就是社会本身，就是人們的社会关系。用他的話來說，社会主义在資本主义内部就已存在和发展着。因而对于这样的社会主义，剝削階級是用不着害怕的。

洛貝尔图不承认生产社会性和私人資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間的矛盾，而只承认資本主义制度下的分配的严重“缺点”。按照他的意見，資本主义制度的威胁到它自身存在的最尖銳矛盾，正是由于这

个缺点。洛貝尔图竭力寻找分配方面的改良方案。他的建議可以归結如下：国家（普魯士君主制度）应当把国民收入的分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在这种条件下，帮助商品按照自身的价值来交换。每个工人得到一张証券，在这张証券上标明了他的劳动的产物。工人用这张証券可以购买他所需要的商品。

按照洛貝尔图的意見，在“社会主义”下，仍然保存雇佣劳动，仍然保存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不仅如此，洛貝尔图的“社会主义”还使資本加强剝削劳动得以固定化。因为工人憑証券只能領得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而其余三分之二則形成利潤和地租（洛貝尔图統称为“租”），也就是剩余价值率要达到200%。洛貝尔图把这种原則称为*Suum cuique*——各取所值。然而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洛貝尔图的“国家社会主义”只不过用以掩飾对工人的掠夺，使德国資產阶级、容克地主和普魯士君主制度的統治秩序至少在最近500年內得以繼續存在下去（見恩格斯：《〈哲学的貧困〉德文第一版序言》，1884年）。

洛貝尔图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为新历史学派的代表所接受，并得到了“发展”。新历史学派是德国資產阶级庸俗政治經濟学中的流派之一，它出現于19世紀70年代。1871至1872年普法战争以后，德国資本主义有了迅速的发展，但劳資矛盾也更为加深了，特別因为在那个时候，馬克思主义思想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已占統治地位，这就迫使資產阶级不仅采用迫害手段，而且也采用实行細小的让步来同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

1872年，历史学派的某些代表如希尔德布兰德、古·施莫勒、阿道夫·瓦格納、路約·布倫坦諾、威尔納·桑巴特等，为了“从讲坛上鼓吹”社会改革，以防止資本主义制度的灭亡，成立了所謂“社会政策联盟”。于是，这一学派就被譏諷地称为“讲坛社会主

义”。讲坛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继承了自己前輩洛貝尔图之流的傳統，充当軍国主义德国的奴仆。其中某些人宣称这个国家的每一措施都是“社会主义的一点一滴”。讲坛社会主义者贊揚俾斯麦的反动政策，帮助他欺騙工人階級。

恩格斯在这里所說的讲坛社会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之流，指的是洛貝尔图文稿編輯者魯道夫·梅耶等人。

恩格斯已在其他場所，表示了关于馬克思“剽窃”洛貝尔图的最迫切的意見〔二，序7〕 这里指的是恩格斯在1884年为馬克思的《哲学的貧困》一书德文版所作的序言。

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出版以后，資產階級企图以“沉默”来扼杀它的陰謀失敗后，便开始对它进行歪曲、誹謗和誣蔑活动。首先出現的攻击，便是洛貝尔图說馬克思曾經“剽窃”了他。这一攻击先头是在暗地里传播着，而且只是少数的几人。但在馬克思逝世后，却被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以及他們的附和者，当做一种毋待爭論的事实而宣揚着。恩格斯为了維護馬克思及馬克思主义不被污辱，坚决地同一切資產階級辯護士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这个序言里，恩格斯对洛貝尔图对馬克思的攻击，給了极有力的駁斥。

首先，恩格斯指出，馬克思在1858年或1859年以前，根本就沒有看見过洛貝尔图的著作。只知道他有《第三社会书簡》一书。因此洛貝尔图說馬克思“剽窃”了他的所謂“租”的理論完全是无恥的誣蔑。

其次，恩格斯指出，在对里嘉图价值論的应用上，洛貝尔图同馬克思走着全然相反的道路。洛貝尔图不仅从里嘉图的价值論开辟了一条通向烏托邦的道路，提出“劳动貨幣”的狂妄主张，而且还引出“普魯士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結論。相反地，馬克思却发展了

里嘉图的价值論，制定出科学的劳动价值論。

恩格斯又指出，洛貝尔图所吹嘘的自己是“第一个发现蒲魯东的构成价值”，实际上他不仅一点也沒有超过里嘉图，只包含蒲魯东思想的萌芽，就是这种思想也早就为格雷和布雷重复过了。实际上馬克思在批判蒲魯东的构成价值同时，也就包含着对洛貝尔图的批判。

在这个序言里，恩格斯依据无可辯駁的事实，深刻地指出“洛貝尔图并没什么可以被剽窃的东西”，說馬克思“剽窃”了洛貝尔图完全是无事实的恶意攻击。

1843年，馬克思在巴黎开始他的經濟研究时，是从英法两国的卓越学者开始的〔二，序8—9〕。馬克思最初是研究哲学和法律的，但在1842—1843年担任《萊茵报》編輯时，碰到了一些經濟問題。正如馬克思后来自己所說的，研究关于盜窃林木法案和研究关于摩塞尔农民的状况，这是最初使他研究經濟問題的推动力。但馬克思真正研究經濟学，則是从1843年移居巴黎以后开始的。馬克思在当时已想写一部批評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的巨著，因而閱讀了英法两国著名的經濟学家亚当·斯密、里嘉图、薩伊、布瓦歧尔培尔等人的著作，并做了摘要。这个时期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学方面著作的成績，留到我們手里的是《經濟学研究（摘要）》和《經濟学——哲学手稿》（1844年）。

在《經濟学研究（摘要）》中，包括馬克思对斯密、里嘉图、布瓦歧尔培尔、薩伊、穆勒等人著作的摘录。在馬克思的摘录里，集中了著作的精华，并附有自己的批評和注释。有許多批評意見实际上已經是短篇論文。馬克思在对薩伊著作摘录中，已形成了研究經濟学的出发点，馬克思对維護私有制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完全

采取否定态度，认为必須在共产主义立場上根本改造政治经济学。馬克思对里嘉图价值論的态度，对說明馬克思的劳动价值論的誕生是很有价值的。

《经济学——哲学手稿》对闡明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有重大意义，实际上在这些手稿中已經奠定了馬克思经济学說部分的基础。如馬克思在叙述斯密的工資理論中，充分地發揮了自己对工資、利潤和地租的分析。在手稿中馬克思也以批評和注释的形式，闡述了自己的关于“疏远化的劳动”（Die Entfremdete, Arleit实际上就是指雇佣劳动）等观点。

馬克思初期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成果，反映在上述手稿中。这些手稿也反映出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家，馬克思主义奠基者一开始就按照完全新的方式提出經濟問題，并按照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說明的方式，解决了它們。

李斯特〔二，序9〕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 1789—1864年），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历史学派的先驅者之一，德国商业工业同盟的創建者和領導人。

李斯特的經濟思想，反映19世紀上半叶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发展上的特点，他极力反对古典学派和經濟自由主义，千方百計地論証资产阶级利益与容克貴族利益的一致性。他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年）一书，其基本內容首先就是对古典学派的批判。

李斯特认为古典学派的最大缺点，就是世界主义和忽視經濟发展的民族特点，他否认一切国家具有普遍的资本主义发展規律，而断言各民族都有自己发展的特殊道路。經濟学的任务就在于确定本民族經濟发展的各种条件。显然，李斯特所指的不是政治经济学，

而是国民經济学；“国民經济”概念是他的經济体系的中心概念。

李斯特极力主张国家干涉經济，反对古典学派的貿易自由思想。他认为經济越是发达，行政立法的干涉就越是必要，在他看来，对工业的扶持和保护关税应该提到首位。他是保护关税政策的創立者。

因此，李斯特的基本論点是毫无科学成分可言的，它只不过反映了当时处于落后状况的德国对于发展資本主义的迫切要求，反映了德国工业资产阶级的愿望。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萊茵新聞》上对洛貝尔图的批評〔二，序9〕 《新萊茵新聞》（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1849年德国革命期間在科倫創办的革命报纸。

在1848—1849年，即《新萊茵新聞》发行时期，作为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的洛貝尔图开始活跃起来，从議員一跃而为內閣大臣。针对洛貝尔图当时的言論和行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萊茵新聞》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如：《汉澤曼內閣》、《妥协辯論》、《柏林的危机》和《丹麦和普魯士的休战》等）中，对他作过不少的批評。这些批評集中于洛貝尔图当时的政治思想与政治活动，例如，他极力维护容克地主的統治地位和阻碍德国統一的君主政体，他的空想財政計劃，以及对旧的反动內閣的妥协和庇护等等。在那个时期，馬克思和恩格斯还不知道作为资产阶级庸俗經济学者的洛貝尔图，所以，批評也就不可能涉及他的經济思想方面。

在1847年的《哲学的貧困》中，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分析〔二，序9〕 《哲学的貧困》是馬克思为反对蒲魯东的《貧困的哲学》

一书而写的。这是馬克思第一部巨大的經濟著作。它标志着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学上所实行的根本革命的开端。

在《哲学的貧困》一书中，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論尚未最后完成，但是已为这一問題的解决打下了基础。馬克思在研究了資本主义下价值規律的作用之后指出：“由劳动時間衡量的相对价值是注定工人遭受現代奴役的公式”，資本主义生产的特点就在于劳动变成了商品。“劳动成为商品这个可怕的事实”，是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是資產階級社会关系的基础。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义社会中买卖的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能創造比本身价值更大价值的特殊商品——“劳动”。在“劳动”的价值和劳动所創造的价值之間有一个差額，这个差額就是为資本家所占有的利潤，所以，資本家榨取工人而获得利潤是不违背价值規律的。馬克思指出，这种剝削关系是由資本主义內在規律所决定了的，是不可避免的。要消灭这种关系就要消灭資本主义。

虽然，在这本书中，馬克思还没有把“劳动”和“劳动力”分开来，但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在这本书里面，所謂劳动作为商品，劳动底买卖乃指劳动力”（見恩格斯为《哲学的貧困》所作的序言），可見，这时馬克思距离創立起剩余价值学說已經不远了。

馬克思1847年在布魯塞的讲演中，对剩余价值的分析〔二，序9〕。1847年秋季和冬季，馬克思在布魯塞尔的“德意志工人协会”中，对德国工人作了几次讲演。在这些讲演的基础上写成了《雇佣劳动与資本》一书，并于1849年4月在《新萊茵新聞》上第一次发表。就这本书的内容來說，可以把它看成是1847年秋发表的《哲学的貧困》一书的繼續。

在《雇佣劳动与資本》中，馬克思进一步明确地說明了剩余价

值的来源問題。他指出，为資本家所占有的生产資料，“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即作为一个属于社会一部分的力量，借交换直接活的劳动而保存起来和增殖起来”便成了資本。它乃“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他在阐述資本与雇佣劳动的交换时写道：“工人拿自己的劳动所交换到的是生活資料，而資本家拿自己占有的生活資料所交换到的是劳动，即工人的生产活动，亦即工人的創造力量，这力量不仅能补偿工人所消費的东西，并且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所有的价值更大的价值”。这样，在劳动力本身的价值和劳动所創造的价值之間便有一个差額，这个差額就是被資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因此，无产阶级的存在乃是資本存在的必要前提，剩余价值乃是由剝削雇佣劳动而产生。

可見，这里馬克思虽然与在《哲学的貧困》中一样还没有把劳动和劳动力加以区别，但实质上，他已看到了二者的区别，清楚的知道了剩余价值的实质是資本剝削雇佣劳动的一种生产关系。（引文均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第67——70頁）

在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原稿第X册（第445頁以下）內，馬克思对洛貝尔图的批判〔二，序10〕 恩格斯这里指的是馬克思《剩余价值学說史》第二卷第二篇第一章中对洛貝尔图的批判。馬克思在本文中原来是批判里嘉图的地租学說，但由于洛貝尔图揚言有了所謂新发现（对里嘉图地租学說的錯誤批評），因此，馬克思又轉向对洛貝尔图理論的批判，即所說“离題的考察，洛貝尔图先生，一种新地租学說”。其主要就是批判洛貝尔图的所謂“絕對地租”与“租”的理論。

首先，馬克思着重批判了洛貝尔图作为里嘉图地租学說的批評

者而創立的“新學說”，即他的絕對地租理論。指出他的所謂“新學說”不僅是基於錯誤的見地之上，而且也是沒有絲毫的歷史觀點，也完全不符合資本主義的現實狀況。正如列寧所說：“洛貝爾圖的理論根據就是假設資本家一農場主也一定會重複這位波美倫地主的錯誤計算（‘不算’農業中的原料產品！）。洛貝爾圖的理論沒有絲毫的歷史主義氣息，也沒有絲毫的歷史現實性，因為他讲的是時間和空間之外的一般農業，是任何國家、任何時代的農業。”（見《列寧全集》第13卷第279頁）

其次，洛貝爾圖的“租”，是他在研究了土地所有權與資本所有權沒有分離的情形之後得出的重要結論。按照他的意見，“租”就是全部剩餘價值（利潤和地租）。由於他混淆了剩餘價值的一般形態及其特殊形態，加之他還把地租、利潤和工資都認作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合理收入，因此，就掩蓋了剩餘價值的真正源泉，抹殺了資本主義的剝削實質。馬克思在《剩餘價值學說史》中對洛貝爾圖關於“租”的理論給予了徹底的批判。

詹姆斯·斯杜亞看破了：一方所得必然是他方所失〔二，序10〕

詹姆斯·斯杜亞是英國重商主義的復辟者，他在利潤來源問題上沒有擺脫重商主義的錯誤觀點。但他否定了商品在其價值以上售賣是財富來源的觀點，他把“積極利潤”和“相對利潤”分別開了。

他說：“積極利潤對於任何人都不会是損失；那是由勞動勤勞，或熟練的增進發生的，並且會引起一般福利的增大或增進……相對利潤却指示某人的損失；它指示財富在各當事人間的平衡變動，但不包括一般財富的增加。”（斯杜亞：《政治經濟學原理》）

恩格斯在這裡說斯杜亞看破了一方所得必然是他方所失，就是指他所謂相對利潤而言，這種相對利潤也就是商品在讓渡時取得的

利潤。斯杜亞認為它是這樣發生的：商品的价格大于它的现实价值，或者說商品在其价值以上售卖。在这里，一方面的利益常常包含他方面的損失，即不会引起一般財產的增加，所以利潤还原为財富在各当事人中間的平衡变动。因此卖主所得到的就是买主所失去的。

斯杜亞在这个問題上的貢獻是：他否定了商品賤买貴卖是財富来源的观点，认为一方所得是他方所失，所以社会財富在商品买卖中根本不会增加的。但是，他仍然沒有摆脱那种认为利潤是价格在价值以上的剩余的重商主义观点。

洛貝尔图的“租”〔二，序13〕 洛貝尔图在研究土地所有权和資本所有权未經分化的社会（即前資本主义社会）时，得出了如下一个范畴，即所謂“租”。他认为工人所得的工資，只是等于生产物价值的一部分，而其余部分就是“租”。这就是說，洛貝尔图沒有把剩余价值的一般形态与剩余价值的特殊表現形态区分开来。

按照洛貝尔图的意見，“租”的变形就是地租和利潤。他把“利潤”看成是資本家因实现国家的經濟职能而取得的报酬。这种見解，和他的先驅者——庸俗經濟学家薩伊、西尼尔之流是毫无区别的。把“利潤”說成是資本家的“报酬”或“工資”，其实就是掩盖了資本家对工人階級的剝削。

至于地租，洛貝尔图也认为是應該存在的，因为地主和資本家一样，也对社会进行了有益的、必要的、虽然是不生产的活动，为此，地主也應該从地租形态上，取得报酬。从这种荒謬的不能自圓其說的見解中，表現出洛貝尔图为地主階級不劳而获辯护的立場。在完全錯誤的見解基础之上，洛貝尔图还提出了他的“絕對地租論”。这种“理論”认为：农业中沒有原料的耗費，而在工业中，原料耗費則不可缺少。因此，工业中垫支資本較大，利潤率（利潤与垫支

資本之比)較低。然而由于竞争,利潤率又有均衡化的趋势,無論工业部門或农业部門的資本家,都只能获得平均利潤。因此在农业中經常存在平均利潤以上的余額,那就是絕對地租。这种看法,反映了他作为普魯士波美倫地主的社會地位。当时波美倫的地主們确实未购买农业原料。但不买进原料并不等于这些原料沒有价值。而且随着資本主义大农业的发展,购进的原料(如肥料等等)会日益增加。所以列宁批判他說:“洛貝尔图斯的理論沒有絲毫的历史主义气息,也沒有絲毫的历史现实性,因为他讲的是時間和空間之外的一般农业,是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农业。”

“不可信賴的修鞋匠”麦克洛克被人談論的时候〔二,序15〕

麦克洛克是英国的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学家,一个“投机的苏格兰人”和騙子。麦克洛克以里嘉图学派的身份出現,是为了在倫敦騙取一个教授的位置。他的著作純粹是以賺錢为目的。到处剽窃,东拼西凑,是他写作的主要方法。当时英国学者模利安就曾証明:麦克洛克在1830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学原理》一书,十分之九的内容是从斯密、里嘉图那里抄写来的,其余十分之一是他以前发表的一些散乱著作的重抄。更可笑的是,麦克洛克还常常把同一篇文章輪流在各个杂志或同一杂志的不同卷内当作新的著作来发表。所以模利安称麦克洛克是一个“不可信賴的修鞋匠”、“一切經濟学家中最經濟的一位經濟学家”。“不可信賴的修鞋匠”这个綽号就是从这里来的。

1920年,麦克洛克开始在倫敦讲授政治經濟学,他在講演中对里嘉图的《政治經濟学和賦稅原理》一书作了通俗的但却是庸俗的解說。在麦克洛克开始活动的那个时期,英国发生了圍繞着里嘉图理論的热烈論爭,麦克洛克打着里嘉图的旗号,参加了当时的爭論。表面上他好象是在捍卫里嘉图的学說,但实际上是彻底地庸俗化了

里嘉图的理論。与麦克洛克开始活动的同时，也出现了利用里嘉图的經济学說来攻击資本主义的理論。这里馬克思所提到的那本小冊子就是这种理論的前哨。

爱德蒙茲〔二，序17〕 托馬斯·姿·爱德蒙茲 (Thomas Rowe Edmonds, 1803—1889年)，英国欧文派空想社会主义者，倫敦保險公司董事長。著有《实用、道德和政治的經济学；或最能使个人幸福和国家富强的政府、宗教和制度》(1828年)。

爱德蒙茲主张幸福是社会的目的，提倡实行社会主义。他认为在人类通向幸福的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是愚昧、私有制、竞争和人口的相对过剩。他对这些现象进行了抨击，而他对私有制的譴責所起的作用，可以比得上欧文派的其他任何代表。

爱德蒙茲对私有制的抨击是以里嘉图的价值和工資理論为基础的。他认为生产全国財富的是生产劳动，衡量一切商品价值的是劳动量，而劳动本身又为生活必需品所衡量(在私有制下)。这样，劳动者無論生产多少，他只能得到他生活所必需的数量，而其余的大部分产品則为資本家所占有。他举例說，当时欧洲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能維持十倍于当时的人口数目的，但因为劳动者所生产的产品絕大部分为資本家所占有了，所以，劳动者的生活状况仍然是很悲慘的。

爱德蒙茲提出了他的关于未来社会的計劃。他說，除了上述阻碍人类通向幸福的障碍外，还有相反的趋势，使人类有可能达到幸福的目的。这趋势就是人們因其社会性而趋于联合和資本因竞争而趋于联合。此外，他还认为存在着所謂“个人利益和公众利益始終是密不可分的整体”的“自然法則”。在爱德蒙茲看来，只要人們依据这些趋势和原則，就可以建立起他所謂幸福的和富强的“社会制度”。他认为这种制度是符合自然和基督教教义的，所以深信它

一定会实现。

爱德蒙兹和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也不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完全是从伦理、道德出发的。所以他也就不可能真正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按照他的说法，实现他的社会改造计划是有产者的事情，而工人是无所作为的。

普列斯提勒〔二，序19〕 约瑟夫·普列斯提勒 (Joseph Priestley, 1733—1804年)，杰出的英国化学家，唯物主义哲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俄国和法国科学院名誉院士。

普列斯提勒因在气体化学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发现而驰名于世。他发现了许多气体和化合物，计达一、二十种之多。但他最大的科学功绩则是在1774年把氧化汞加热分解出氧气。但他对这一巨大发现不能做出科学的阐释，没有得出新的理论结论，而仍把自己束缚于流行的“燃素说”把它叫做“无燃素气体”。后来著名的法国化学家拉瓦节，推翻燃素化学的巨大革命就是根据他的发现重新进行实验研究的结果。

在哲学上，普列斯提勒坚决反对二元论，认为人的感觉和思维“并没有物质所具有的任何属性”，相反，仅仅是人脑这一物质活动所产生的能力。在认识论上，他认为感觉是一切抽象思维的基础。但他的唯物主义是机械的和自相矛盾的，这表现在：他用自然神论去反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战斗无神论，主张与宗教调和；他用物体“振动”的原理和观念之间简单的机械的“联合”，去解释整个能动的复杂的思维过程。

在政治思想上，普列斯提勒比较激进。他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热心拥护者，民主自由的坚决捍卫者。他认为人民不但有起义的权利，而且有推翻封建暴政的义务。因此，他一直受到英国反动

当局的迫害，并被逼移居到美国。虽然普列斯提勒在美国只生活了十年，但对美国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期的先进哲学思想、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思想的发展，都有重大的影响。

希勒〔二，序19〕 卡尔·威廉·希勒 (Karl Wilhelm Scheele, 1742—1786年)，杰出的瑞典化学家。从14岁起作了八年的药房学徒，1775年被选入瑞典科学院，继后获得了銓叙职位，并成为一家制药厂的主人。但他的終生事业乃是化学实验和科学研究工作。

希勒在化学领域内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的重大发现，有“希勒綠”（即亚砷酸銅）、氧气和酸类盐类物质等好几十种。同时他还考查和阐明了許多物质的化学性能。希勒在研究方法上，特别着重实验和观察，凡一切能用实验、复制等最直接最显眼的方法来檢驗理論結論和証实理論上的疑难問題，他絕不放过，这是他成功的“秘密”之一。

但他最卓越的功績，却是在1773年（比普列斯提勒早）从硝酸、硝石、一氧化錳、氧化汞和其他物质中取得了氧气。可是他在1777年才正式出版《空气与燃烧》一书，对此仍作了錯誤的解释，认为空气系由“助燃气体”即“燃素”和“窒燃气体”两部分組成。可見，他虽然科学地发现了空气中有一种气体可以“助燃”，并按“助燃性”这一标志把空气分成二类，但他对“助燃气体”（即“氧”）的說明却仍旧陷于荒謬的、陈腐的“燃素理論”的錯誤泥潭中。

拉瓦节〔二，序19〕 安东尼·洛兰·拉瓦节 (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 1743—1793年)，法国卓越的化学家，近代化学

的建立者。他生长在18世紀末叶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代，是当时反革命的君主立宪政治的拥护者。革命前曾担任硝和火药管理局长，又是承包国家稅收的“专卖公司”成員。由于他反对革命，所以在1793年被处死刑。

政治上反动的拉瓦节，在自然科学上却有巨大功績，他完成了化学上的革命变革，推翻了統治当时整个化学領域的“燃素理論”，使全部化学建立在新的科学基础之上。本来在拉瓦节以前的俄国科学家罗蒙諾索夫和与他同时代的英国化学家普里斯提勒、瑞典化学家希勒，就已經在实验中发现过氧气，但因他們都不理解自己的发现，所以仍然广泛地应用着“燃素”的假說。拉瓦节却根据普里斯提勒的发现，运用实验、分析的方法，和物质不灭定律的原理，証明磷在空气中燃烧后，会使磷的重量增大，会使空气的体积縮小；而錫在眞空的密閉器中加热，它的重量却不会改变。这样他就发现空气中有一种助燃的气体，它和物体結合就能够产生燃烧現象。他在这种实验和其他研究的基础上，写成了《关于燃素的分析》和《初級化学教科书》两本著作，彻底批判了“燃素”的假說，正确地指出了燃烧現象是物体和氧气化合过程的化学反应，从而創立了氧气的学說，使“在燃素形态上倒立着的化学，方才正立起来。”

洛貝尔图把剩余价值改造为一种烏托邦〔二，序22〕 洛貝尔图看到了剩余价值存在的事实，把包括利潤和地租在內的全部剩余生产物称之为“租”。但是，他根本不了解剩余价值的实质和起源，所以由此得出了空想的和反动的結論。

洛貝尔图看到，随着資本主义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人在社会产品中所能得到的份額会不断下降。他认为，这就是資本主义矛盾和危机的根源。按照洛貝尔图的意見，如果把工人所得的

份額固定下來，那末就可以消除資本主義的矛盾和危機。由此，他杜撰了所謂“國家社會主義”。

在洛貝爾圖的“社會主義”里，社會產品是由國家進行分配的。國家發給工人一張證券，在證券上面標明他的勞動生產物的數量，而每個工人則憑證券領取與自己生產物的勞動時間相等的、自己所需要的物品。但是在洛貝爾圖看來，工人不能領取自己勞動所創造的全部生產物，而只能領取其中的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二則作為“租”，歸地主和資本家占有。換句話說，洛貝爾圖企圖把剝削率固定為200%。

在洛貝爾圖的“國家社會主義”中，絲毫也沒有社會主義的氣息。正象恩格斯所說的，洛貝爾圖的方案只不過用來掩飾資本家和地主對工人的掠奪，使德國資產階級、容克地主和普魯士君主制度的統治秩序，至少在最近五百年內得以繼續存在下去（見恩格斯：《〈哲學的貧困〉德文第一版序言》）。同時，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工人階級日益相對地和絕對地貧困化，剩餘價值率會不斷地提高，資本主義矛盾也必然日趨尖銳。因此，洛貝爾圖想把剩餘價值率固定為200%，以此來緩和和消除資本主義矛盾，也完全是一種徹頭徹尾的烏托邦。

洛貝爾圖的“消費不足論”〔二，序22〕 洛貝爾圖承認資本主義制度下存在着經濟危機，但他把勞動群眾的消費不足看作是發生經濟危機的原因。

洛貝爾圖認為：危機的產生是因為社會購買力受到了限制，而社會購買力則取決於國民生產物在資本家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的分配。洛貝爾圖不承認工人階級收入（即工資）的絕對水平的下降和工資數量的微薄，而只承認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工資在生產物